



博士论丛

中国现代史学 思潮研究

张书学著

A STUDY OF
HISTORIOGRAPHICAL
THOUGHT IN
MODERN CHINA

湖南教育出版社



博士论丛

中国现代史学 思潮研究

张书学著

**A STUDY OF
HISTORIOGRAPHICAL
THOUGHT IN
MODERN CHINA**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国家“八五”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

张书学 著

责任编辑：聂乐和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印张：17.75 字数：470000

1998年2月第1版 1998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55-2443-5/G·2438

定价：26.4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张书学, 1963年3月生, 山东牟平人。1981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 1985年获学士学位, 1988年获史学理论专业硕士学位, 毕业后留校任教。1994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 历史系副教授, 山东省史学会理事。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和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史的教学和科研。对中国现代史学思潮发展史, 用力较多。曾参编《中国现代史论选》、《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史学思想研究》等著作, 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和《高等院校文科学报文摘》等转摘和摘要。

序

田 昌 五

《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一书就要出版了，这本书是书学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增补加工而成的，我为此感到高兴，一颗新苗又要成长起来了。

自1902年梁任公发表《新史学》以来，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这近一个世纪，如以建国前后为界，正好分为两半：建国前约半个世纪，建国后约半个世纪。本书所写乃前半个世纪，即建国前的中国史学思潮。我们通常称之为现代史学，而称建国后的中国史学为当代史学。当然，就历史学的发展而言，这样划分未必妥当，因为前后两段是不能截然断开的。但这样划分也有好处，好处何在呢？姑妄言之。

中国现代史学发端于本世纪初，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后，至“五四”运动而奠定了初基；十年内战时期是其深入发展的阶段，至抗日战争时期而趋于成熟；到建国之前，遂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史学流派，出了不少史学大家。这些史学流派尽管各有特色，但统可归之为新史学。说是新史学，是对比中国传统史学而言的。新史学中有些和乾嘉考据学派有某种联系，但任何一派都不能说是乾嘉考据学。乾嘉考据学重在音韵训诂，亦即所谓“小学”，我们能以此界定中国现代史学或其中的某一流派吗？即使是古文字学，我们也不能称之为乾嘉朴学。

这些史学流派本来各有其来历和名号，但建国后却被人为地分成两家，即资产阶级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而且，由于中国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资产阶级史学也被加封，成为封建资产阶级史学。毫无疑问，这种划分已经超出了学术的范围，而是一种政治划分，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问题了。解放前，各个史学流派之间也有分歧和争论，有时在一些问题上争论得还相当激烈，但一般说来是学术性的，即使是带有政治色彩，也还是学术性的，除非某些明显的政治问题。这种政治划分就不同了，资产阶级史学是要接受改造和批判的。于是，随着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思想路线上的大批判，一些所谓资产阶级学者，要么改头换面，穿上一件大红袍；要么掩旗息鼓，隐声敛迹；而有些人甚至遭到了厄运。作为一个见证人，回顾此情此景，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更令人遗憾的是，随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深入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中开始了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有些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也遭到恶运，或受到严重威胁。这样，由建国前逐渐形成的史学流派就所剩无几了。我们常说在学术上要贯彻双百方针，实行百家争鸣，但如此这般，还能鸣得起来吗？

降至文化大革命，事情就更糟糕了。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因而，所有史学流派非资则修，全被打倒。斯文扫地，一些史学大家能幸免者仅焉耳！拿学界尊称的五老来说，郭老抱恨而终，侯老抱恨而终，翦老不得其死，吕老曾身陷囹圄，范老虽得到一顶保护伞，但这顶伞也是一顶帝王将相派的帽子。

说这一些，并不是要算什么旧帐。我从不为个人算旧帐，也不会替别人算旧帐，更不会拿别人来算帐以自高。但不说这一些，一些史学流派的问题就说不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常发展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何以言之？

在文革后提出了拨乱反正的问题。这本来是正确的、应该的、必要的，但在史学领域中如何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无论在理论上

还是实践上，都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什么问题呢？

问题之一，就在于什么算是“正”？怎样才是反乎正？此义不明，于是在操作上就出了毛病，一些人在那里做起简单的“翻案”文章来了。过去所说资产阶级史学是遭到过批判的，现在反过来予以全盘肯定，而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则遭到了否定。过去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所谓的修正主义或其倾向是遭到过批判或受到压抑的，现在也要倒转过来。结果，拨乱反正变成了拨乱反旧，甚至拨乱反乱，许多学术上的是非就更没准了。例证甚多，不举为好。

我们认为，要拨乱反正，首先是还其本来面貌。例如，胡适自称实验主义，我们就还他一个实验主义。傅斯年自称德国学派，信奉实证主义，我们就还他一个实证主义；陈寅恪与此大同小异而自称事证主义，我们就还他一个事证主义，如此等等。过去称之为资产阶级史学，属于乱扣帽子，摘掉就是了。但摘掉这顶帽子，并不等于说这些史学流派就无可非议了；或者说，我们就只能以这些史学流派的是非为是非了。这里还有一个学术上的是非问题，学术评估问题。有的已有自评，可予同意。如傅斯年说“历史学只是史科学”，我们就可把这一派摆到史科学的位置上去；有的自称是考据学，我们就可以将之摆到历史考据学或考据历史学的位置上去，等等。要之，挂牌定位，悉听尊便。不过，如何定性，就另当别论了。记得胡适曾经说过，用他的历史研究法，既不会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也不会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我听过胡适讲授的历史研究法，看不出他那一套会有那么大的神通，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是不行的。

我曾经说过：王国维的互证法、胡适的考据法、顾颉刚的辨伪法、傅斯年的“科学”法、陈寅恪的事证法，等等，都属于形式逻辑的范畴。用形式逻辑的方法，也能作出成绩来。因此，不加分析地进行批判，妄予否定，是不对的。但仅仅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如胡适所说“剥笋的方法”、“祖孙的方法”，等等，也容易

出现偏差。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用的主要是剥笋的方法。所谓辨伪犹如我们常说的剥去伪装，层累地造成的历史，亦即逐层伪造成的历史。加以顾颉刚有今文经学的颇见，连《左传》和《周礼》这两部书都说是刘歆伪造的了。我们不能说顾颉刚的辨伪工作一无是处，但其偏差是显而易见的，而他用的就是得自胡适的方法。陈寅恪的事证主义也有其局限，闹不好也会出毛病。如他提出的魏晋士族门阀的两条标准，一曰门第，二曰婚宦，就是类比附会而成的。所谓门第，说的是经学门第转为玄学门第，而婚宦失类取之于《晋书·杨佺期传》。然考之实际，并非如此。如西晋平吴时的征南大将军杜预，曾注《左传》，可说是经学将军，他号称杜征南，是不是高门士族呢？类似的例子还有泰山羊家，世传经学，羊祜参与平吴为将军，等等。反过来说，有些著名的玄学家如何晏、嵇康等，都不是由什么经学世家转过来的。何晏的祖父何进是个南阳屠户，因其妹被选入宫为汉灵帝皇后，他被授予大将军。何晏是曹操的养子，曹操也不是什么经学家。两不落实，所谓经学转玄学才能成为高门士族，能够成立吗？至于杨佺期传中所说“婚宦失类”，指的是他“祖没于胡”，他可能有胡人血统，与门第婚并不相干。再说，魏晋设九品中正制，中正选士是不是以这两条为标准呢？傅斯年宣称他的科学法是绝对客观的，然而在一些问题上却不免主观臆测，望文生义。例如，他看到《诗·商颂》中“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就以为商之先公相土跨渡今之渤海湾，远征到辽东和朝鲜半岛去了。实际上，这里的海指巨野泽。巨野泽古称勃海，亦称东海，史有明文。海外有捷，不过是打到巨野泽以东而已。问题还有，不再说了。说这一些，就在于给这些史学流派以应有的评价，不能由他们漫天要价，用实验主义、实证主义、事证主义之类的初级产品代替马克思主义，更不要说以此反对马克思主义了。

我曾经说过，治史不仅要用形式逻辑，更重要的是用辩证逻辑

辑。二者的关系犹如初等数学与高级数学的关系。所以，要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上运用辩证逻辑，在辩证逻辑的指引下运用形式逻辑。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属于辩证逻辑，即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我们怎能将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对立起来呢？当然，我们不能强求任何人都接受马克思主义，但总不能听任一些人蓄意反对马克思主义而不顾吧！

对上述史学流派，我们是这样估价的，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也要有一个恰当的评价，不能有所偏袒，更不能有任何歧视。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由李大钊开始的，是他最早应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但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的形成则是从30年代开始的。那时有一次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际性大讨论，在中国发生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其目的在于探讨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和发展规律、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由于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中国历史同样经历了人类社会的相关发展阶段，而且将来必然要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流派有别于其他史学流派（其中也包括本书所说梁启超派）的。所以，其他史学流派可以复其旧名，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名称则可以不动。用《荀子·正名篇》的话说，这里有一个共名和分名的关系问题，而其他史学流派是没有共名的。到建国前后，在马克思主义史学营垒中的各个史学流派，大致可以作如下划分：就先秦史而言则可分为3派，即郭派，侯派，吕、翦、范派；就秦汉以下的历史而言，则可分为两派，即侯派和范、翦、吕派；郭很少言秦汉以下，但可归入后一派。另外，还有以尚钱为代表的一派，不见于建国之前，是解放后从苏联引进过来的，所以尚钱私下自称莫斯科学派。

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既然都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有关系，所以他们都以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为前提。郭沫若认为

亚细亚生产方式指原始社会，所以他的体系是按古代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安排的。当时的情况是，中国的原始社会不可知，因而他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以商、周之际为界限的。前此为原始社会末期，至西周进入古希腊罗马式的城邦公社时代。古希腊、罗马有相当发达的奴隶制，西周亦然。有人指责郭老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说的奴隶制是西方型的，并没有错。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多就文献材料立说，而文献间或有缺，于是他转入甲骨、金文，对甲骨文和金文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考释，据以论证中国古代社会问题。郭老不仅是古文字学家，与王国维、董作宾并称三堂（郭鼎堂、王观堂、董彦堂），而且是依据甲骨文和金文所提供的第一手资料论证古代社会的首倡者。有人指责郭老重考古而轻文献，是不对的。正是通过对这些材料的系统整理和考释，他才改正了在《古代社会》中的一些看法。例如，他原来对井田制持否定态度，认为不可能有那样方方正正的井田，但从金文中看到“赏毕土方五十里”这条材料，他改变了看法，认为井田制确有其事。不仅如此，他还把奴隶制时代的上限提前到了商代，进而上推至夏代，下限始而断至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继而断至秦统一，最后参照“自周秦以来”断在春秋战国之际。有人认为，郭老在发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后，就没有著作了，而他的《奴隶制时代》是建国后出版的。实则，《奴隶制时代》不过是他研究了甲骨、金文后的总结而已。至于奴隶制形态，他认为属于黑劳士型，因而定名种族奴隶制。前后相较，有一个问题他不再谈了，即《古代社会》中所说西周城邦制。他用了一个新名词：原始的部落殖民。可见，有人指责郭老说的奴隶制是什么西方型的（即劳动奴隶制），纯属无的放矢。

在郭老放弃了西周城邦制的观点之后，外庐师重新谈起了城邦制。他也是从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出发的，只是他的理解与众不同而已。在他看来，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一种不成熟的城邦

制，即早产的发育不良的文明儿童。所谓不成熟的城邦制，指的是由氏族制直接发展而成的城邦制，而古希腊、罗马的城邦制则是在氏族制彻底解体后出现的。所以，欧洲古典古代就有公民社会或国民社会；中国古代在很长时期内是不存在国民阶级的，执掌国家政权的是一些氏族显贵。周代的所谓天子诸侯公卿大夫，不过是一些大小氏族显贵而已。但这不等于奴隶制不发达，他不懂甲骨、金文，在他看到郭老的一些考释后，认为那么多的奴隶是不能用家内奴隶制来概括的。因此，他提出了氏族集团奴隶制。实际上，他所说的氏族奴隶制就是郭老所说种族奴隶制。但他又不同意把奴隶制的上限往前提，这倒不是因为他完全不同意郭老对甲骨文的考释，而是在他看来，商代只是氏族城邦制的萌生期，还没有完全形成氏族城邦制。不过，对奴隶制的下限，或者说封建制的上限，他与郭老的看法就不同了，而是推至汉武帝，其标志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他的话说叫“法典化”。一般人很难理解这是什么意思，但联系到他所说的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身份性地主和非身份性地主以及把孔孟视为氏族贵族的代表，就明白了。他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是维新式的，死的拖住活的。士族地主就是由氏族贵族转变而来。由氏族贵族国有土地制转变为士族地主土地国有制，所谓土地私有和土地买卖，不过是法律虚构而已。这些，我已有专文，就不多说了。所要说明的是，有不少人把他的封建国有土地制说成亚细亚生产方式，这是不对的。他既把氏族贵族土地国有制定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因而封建土地国有制不过是其残余而已。所以，郭、侯两家在奴隶制的问题上是没有矛盾的，矛盾只在下限，他反对郭老说的土地私的制，而郭老提的土地私有化的途径的确是有问题的。分歧还表现在郭、侯对儒、墨的不同评价上，因越外本题，从略。

吕、翦、范是又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不过他们之间也略有差异，范是不谈农村公社的。这是不是因为受到中共六大决

议的影响，不得而知，好则这只是大同小异，可略而不谈。西周封建论的首倡者是吕老，他是参加过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如前所说，那时发生过一次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际性大讨论，在讨论中有一种意见，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是封建制。吕老经过反复考虑，选择了这一观点，并以西周社会当之。当然，他们主要是按公、卿、大夫、士或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建立自己的封建说的。井田制或农村公社，只是一种剥削形式。耕种土地的是庶人或庶民，他们视之为农奴。所以，西周封建论说的是领主封建制或领主农奴制。井田分公私两部分，私田是农奴的份田，公田是领主用以剥削农奴的，所以地租形态是劳役制，即劳役地租。之所以从西周开始，是以周初的大分封为依据的。因此，翦老又将周灭商看作蛮族入侵罗马。由于周代有宗法制度，范老又将宗子视为领主。因而，西周封建制又是宗法封建制度。这种封建制至春秋而崩溃，到战国后土地私有，转为地主封建制或租佃封建制。直到鸦片战争，而后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周封建论的问题在初不在其下限，而是其上限。那时候，商代的社会情况尚不明了，夏代更加渺茫，前此更不用说。这么早就进入了封建社会，怎么解释呢？于是有人提出中国文明早熟论。郭老是反对这种说法的。不仅如此，在解放前这几派之间没有交过锋，他们之间相互交锋是解放后的事。我们必须如实地看待这一段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不能用今天的眼光，甚至解放后史学界的争论来看待这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譬如说，郭老的《古代社会》现在看已经过时了，而且他本人也早已放弃了其中的观点，但他提出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仍是不能轻易否定或低估的。记得杨向奎同志有一次说过，在他念大学的时候，不要说什么通史，连断代史都是不全的。在这种情况下，《古代社会》作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何可厚非？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也要有历史主义态度，正如对古史辨派一样。郭老就不像我们有些人那样否定

古史辨，因为研究历史，辨伪的工夫总是不可少的。

说到这里，似乎应当结束了。但仅止于此，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许多问题是和解放后的讨论有关的。解放后，史学界提出了5个问题进行讨论，即：古史分期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封建社会土地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后来人们所说的五朵金花，即指此而言。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和派生的问题。

在这些问题中，关乎全局的是古史分期问题。古史分期，原本只有两家，勉强说可谓三家。解放后突然冒出一家，即魏晋封建论，侯派不上不下，因而在讨论中呼声不大。魏晋封建论是就其分期的下限而言的。在此之前，他们将中国历史分为两段：先秦为不发达奴隶制，秦汉为发达奴隶制。所谓不发达奴隶制是苏联学者彼·司徒卢威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一种解释，即：只有家内奴隶，广大劳动者是村社成员。后来在研究东方古代社会中发现并不如此，于是又加上一段发达奴隶制。因为是进口货，所以范老批判他们是削足适履。郭老因为不同意西周封建论，认为讲秦汉奴隶制比讲西周封建制要好一些。我本人原来是相信此说的，后来改变了看法。原因是，此派无法解释秦汉时期3次大规模农民起义问题。就连此派的人，在谈到农民起义时也说反对封建政府的。这就怪了！哪有发达的奴隶制社会中农民不断起义反对封建政府的呢？至于不发达奴隶制，则取决于两个问题：马克思所说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原意是什么？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井田制是不是农村公社？我经过研究，确认马克思所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是原始社会，井田制并非农村公社。这些，我都有长文论述，就不在此多说了。但我并不完全同意郭老的看法，所以把我说成郭派是不对的。郭老不同意周代有宗法制度，甚至连说宗族都表示怀疑。而我是以宗族为基本线索研究古代社会问题的。这一点，我受到了外庐师的启示。他理解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错误的，但错

误的理解中含有合理的东西。他说的“氏族”实乃宗族，改为宗族解释古代社会问题，就顺通了。至于庶民，也和姓氏有关系，他们是因为被征服，从百姓降为庶姓之民的。亡其姓氏，那就要“堙替隶圉”，降为臣妾了。庶姓之民是什么，后来我给了它一个名称：古典农奴，即所谓的黑劳士。这样，我又改变了西周封建论。所以，我的古代史体系是斟酌各家，依据考古资料建立的宗法城邦体系。郭老的体系中还有一个问题，封建土地私有制是在井田外开辟了私田发展形成的。而我则证明：封建社会中的土地私有制是通过战国时的提封授田制发展过来的。这和我对商鞅变法的研究有关系，原来我就是以商鞅变法划分两个奴隶制阶段的。

说这一些，并非要宣扬己说，而是为了提供一个靶子：我的学生是按我的观点评价各家之得失的。如他有不对的地方，我应承担责任的。还有一点要说的，这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后来却被作为政治问题进行批判。尚钺同志因此蒙受屈冤。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应作检讨。但最早发起批判尚钺的是黎澍同志，我写的文章也是由他修改的。我不能把自己的错误推给黎澍同志，也不愿批评黎澍同志，但说明情况还是必要的。

在封建社会土地问题的讨论中，涉及到侯老的土地国有说问题。对这个问题应如何评价呢？从表面上看，侯老的土地国有说是亚细亚型的。在《关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些普遍原理》一文中，甚至把土地国有说推广到所有封建社会，连欧洲中世纪也是如此。但是，当有人说他的土地国有说是所谓亚细亚式的时，他又表示不同意。这其中的奥秘何在呢？我忝列侯门，略知其意，向书学讲解了这个问题，同时也写了文章。但这样一来，也牵涉到了我自己。我原来主张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土地私有制始终占有主导地位，并反对侯老的土地国有说的（当然我的反对与别人不同）。后来改成国有和私有是周期性相互转化的。错必须改，才能对马克思主义的各个流派作出正确的评价。

在评价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时，还牵涉到翦老问题。翦老的西周封建论，和吕、范是相同的，但他参与了农民战争的讨论，这又是和吕、范有所不同的。让步政策是讨论农民战争问题时提出来的，后来被老人家一箭射死，翦老因此在文革中蒙冤受屈。黎澍同志约人按他的意见写了一篇农民起义的目标就是改朝换代的文章，也被人扣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不止如此，在58年大跃进时，许多年青同志提出打破王朝体系问题，意思是要破除按帝王将相编写的历史，编写一部劳动人民的历史。范老不同意，写了《反对放空炮》一文，郭老说要保留王朝体系的框架，结果都被带上了帝王将相派的帽子。翦老说不能只有阶级观点，没有历史主义，最后也被带上了帝王将相派的帽子，含冤而死。文革后要拨乱反正，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呢？

一种办法是对着干。例如，你说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我就说生产力是历史的动力；你说奴隶们创造历史，我就说英雄创造历史；你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者说洋为中用，我就说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你说中国近代社会的矛盾之一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我就说是开门和关门的矛盾；你抬高农民，我就贬低农民，等等，等等。再如，在文章中加塞带刺，如什么陈伯达、戚本禹之流云云。大有你要打倒我，我非要打倒你不可的架势。这样，不仅把是非搅乱了，而且把史学战线也搅乱了。如前所说，建国后讨论过5个问题，形成了不同的流派，解放前的学者“不逃杨，则归墨”，也分入不同的流派。如果以一派之是非为是非，能不乱吗？谓予不信，请看对郭老身后那场全面围攻好了。这且不说，在纷乱中早已被否定的中国历史亚细亚形态说又抬头了。

这是一些理论问题，理论上的问题是不能做简单的翻案文章的。要做好这篇文章，关键在于解决中国社会是不是停滞的，或者如金观涛所说是“超稳定社会结构”。理论要联系实际。比

方说，历史主义是辩证法，其义为历史的辩证运动，这就和停滞型相矛盾了；反过来说，如果停滞型也有运动，那就是非辩证的运动了。说句粗话，那样的历史运动也不过是瞎驴拉空磨，磨来磨去，损坏了磨，却没有磨出面粉来。

我们仔细研究了这个问题，结果发现中国历史是呈周期性辩证式运动的。农民问题与土地问题不可分，土地运动和农民战争都是周期性循环进行的。开始我们认为这种运动是由民族间的矛盾与冲突造成的，后来发现这是由于官府控制和操纵了工商业导致商业资本的畸形发展造成的。这些，我已有专文并汇成专著出版，就不在这里多说了。

感谢小平同志，是他提出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我才敢于提出破除长期停滞论的。我们对农民战争的讨论都逃不出建立在长期停滞论基础上的循环圈。所以，只有破除长期停滞论，才有可能评价各家的是非，还农民战争以本来面目。我对书学说，要把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放在同一把天秤上来衡量，不能有所偏，这把天秤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我提出的论点未必完全正确，但我相信这把天秤是不会错的。有些好心的朋友对我说，不少人都不坚持马克思主义了，你还坚持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也有人给我开玩笑说，你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出不了国啦！我说，出不了国拉倒，我不能因为要出国就放弃马克思主义。我用这把天秤来衡量别人，也用这把天秤衡量自己，在不断进行自我解剖中前进。当前的问题不是要进行什么批判，而是要斟酌各家，考其得失，从而建立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观古而知今，察往而知来，为振兴中华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不赞成斯大林那本历史唯物论的小册子。但他说过的一句话是很对的，这句话就是：要用通晓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武装起来。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就是为了求得其中的规律，从而找到我们应当前进的道路。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各个流派都是要探讨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这是其共性，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点；但他们又是按照各自预设的公式来研究中国历史规律的，因而他们所说的规律都不是或不完全是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抽绎出来的，这又是他们的通病。他们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都是以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依据欧洲历史提出来的发展图式和论断为指导，而没有或没有完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如古史分期问题以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解为前提，农民战争问题以按长期停滞论所规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前提，民族问题以斯大林所提4条标准为指导，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以欧洲或俄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为依据，土地私有说看起来是按中国历史实际立论的，然而它又是从属于长期停滞说的。如此等等，在解放以来的文章和著作中俯拾皆是，不管是引用不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论断。所以，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评定各家的得失，而不能以任何一家之是非为是非。只有这样，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以中国历史发展的真实规律为现实服务，即为制定我国的发展战略和策略提供历史依据，掌握好前进的方向盘。

书学是我的学生，我希望他不要固守师说，而要学我的治学精神，在不断检查师说和自己的得失中前进。现在这本书就要出版了，但就书学来说还仅仅是开始，我为他高兴。我也为自己有这样的学生高兴，但要看到自己在学术和理论上还不成熟，要使自己在学术上理论上成熟起来，还要走很长的路，付出艰苦的努力。我希望他能早点成熟起来，成为21世纪的史学理论大家。

写多了，就这样打住吧！

1996年7月5日凌晨

于山大寓所